“障碍媒介”与本土化传播观：中国屏风的媒介符号学考察

蒋晓丽　李　兴

内容提要　论文借助媒介符号学的视角考察中国古代的屏风，讨论其媒介生成逻辑与符号表意机制。屏风作为媒介符号的连续体，其符用与广义“媒介”功能具有历时性演化脉络，无不凭靠其自身的物质障碍性来承载。屏风在古代人际传播实践中延长了时间刻度，增幅了空间距离，交往因此被屏风隔断和悬置，但与此同时被传播的意义得以创生。此种“障碍”的媒介性使意义的生成和传播发生转换，此前被隔断的交往实践，在意义的补余中变得通达和自洽。借助自身的障碍性，屏风的媒介表意内嵌着“去媒介”和“再媒介”的层次逻辑，铭刻着物质与符号的递归与转化。而此种“有隔有通”的本土化传播观念，借以“障碍”挑战西方媒介缩减时空，起到连接作用的本体论宣言。通过检视屏风这堵东方之“墙”，论文试图丰富媒介思维的谱系，而这显然已有足够基础去讨论一种不同历史性质、不同当下智能技术高速发展的含蓄、慢节奏在地媒介体验和在地媒介知识。

关 键 词　中国屏风　障碍媒介　本土化传播观　媒介符号学　华夏传播

一、大邦维屏：中国屏风及其障碍的媒介性

古人较早便意识到物质屏障的政治功能。如《诗经·大雅》中说“大邦维屏”[①]，屏障首先构建起一国之墙，而后大国才能作为民众的保护屏障。而屏风则是古人之于屏障调用的一种日常物质文明实践。无论作为家具陈设，抑或绘画的媒材，屏风在中华历史文化的源与流中被不同时代所铭刻。文震亨在《长物志》中载：“屏风之制最古”[②]，可以追溯至夏商时期；明人罗颀在《物原》中说：“禹作屏风。”[③] 周朝以降屏风用以指代天子威严和权威的等级工具呈现，《荀子·大略》中便记载：“天子外屏，诸侯内屏，礼也。外屏、不欲见外也；内屏、不欲见内也。”[④] 可见自屏风被发明起，其便借由物质性真实地在场，承担遮挡视线的屏障功能。彼时，它在中国古代政治和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很大程度上基于自身的物质 –

① 《诗经·大雅》，朱熹注解，张帆、锋焘整理，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 年，第 300 页。

② 文震亨：《长物志》卷六，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年，第 45 页。

③ 罗颀：《物原》，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年，第 33 页。

④ 《荀子》，祝鸿杰注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241 页。

符号属性。例如刘熙在《释言》中说："屏风，言可以屏障风也。"[①] 因此，作为"屏障"其遮风的物质效用成为日常生活化的前提；作为建筑形式，其具有空间分割和意境层次生成的形式功能，所以古人又说："亦所隔形者也"[②]；作为装饰装置，它承担着艺术符号的审美界面，为此羊胜特地作《屏风赋》："重葩累绣，沓璧连璋。饰以文锦，映以流黄。"[③] 直到唐宋之后，屏风才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一时期屏风不仅作为文人言志的关键意象，同时也继续保持隔断的物质功能和发挥其诗画媒介的载体功能。

学界之于屏风的"考古式"研究，集中考察不同历史时期的器具工艺、绘画媒材及其艺术价值。而本文聚焦屏风作为一种媒介的生成逻辑，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以屏风为媒"的表意机制。正是在作为物质器具、信息表面、审美对象的三位一体中，将屏风视为物质载具同时也是审美符号，进而也是一种特殊的媒介。事实上，屏风的媒介性并非仅留停在绘画载体的"界面"层级，屏风还以物质基底真实地建构、调试和纠缠化古人的传播场景。表层上，应然承担隔断作用的屏风，以取消传播可见性的机制中止了传播过程，但内里并未实然隔绝人际交往和场景营设。也即此时传播的意义并未被终止，屏风以"障碍"的符号姿态，赋予并携带新的意义，中止的仅是传播过程。这提示了一个疑问：暂时褪去承担符号载体，也即"呈现媒介"的功能之外，屏风的遮挡与阻隔功能，是否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媒介性？——它违拗了英尼斯（Innis）的媒介偏向论，屏风既不偏向时间，也不偏向空间，反而增幅传播的空间距离，延长传播的时间刻度，但是自始至终传播的意义却并未断绝，反而又被屏风生成，又将被中止的传播过程接续而起。

当下媒介技术更迭的取径，多半铭刻着进步主义的线性媒介主流叙事。海底电缆、云上存储等媒介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维护，无不诉诸社会对即时通信的想象；虚拟或混合现实技术设备的流行说明手册，也传递着个体对于沉浸式具身传播的向往。但他们都忽视了"障碍"是传播的固有成份，以及不受欢迎但无法避免的对手。中国古代的屏风并没有发明障碍，而是试图赋予"障碍"一种可见的形式，进而正视"障碍"的意义，它帮助创生和推动被中止的传播过程。此种"曲折"的传播过程，显然越过了"传播必通"的功能目的论预设，也质询了西方经典的媒介谱系和本体论。

有鉴于此，本文对中国古代屏风采取"识旧如新"式考察，试图回答此种具有"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传播意蕴，以及中国本土化的"含蓄"、"曲折"的慢节奏媒介经验，如何松动媒介是缩减表意距离，起到连接功能之中介物的既定共识。再进一步，以意义的视角勘察"障碍"，其是否能作为学科范式、国别媒介认识论之间的互补、互释的证言？

倘若本文意图回答前述的疑问，首先需要对研究选取的视角加以引介，这有助于说明本文的解题思路为何可以从媒介符号学视角得到厘清。

二、重屏[④]：从传播符号学到媒介符号学的视角转制

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于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的"元传播"（meta-

① 刘熙撰：《释名疏证补》，毕沅疏证、王先谦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 年，第 294 页。

② 谢维新：《事类备要》第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696 页。

③ 陈仁子编：《文选补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第 534 页。

④ 此处借用巫鸿所著《重屏：中国绘画中的媒材与再现》中的概念，以说明屏风作为媒介物质符号的重叠且连续属性。

communication）概念，帮助设定了传播符号学的话语早期理路。“元者，万物之本也。”① “元传播”便是把握传播的本质和开展传播实践的基础，“人为了传播不得不进行元传播活动”②。然而应当给予重视的是，贝特森是从符号的层级来进一步阐释“元传播”概念的，传播交流活动地开展，建立在传播者关系之上，我们得以开展传播交流活动，而这种关系筑基于系列以符号为标志的索引之上。“如果我们对传播的演化进行推测，很明显，当生物体逐渐停止‘自动’反应时，这种演化便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也就是说，认识到对方和他自己的符号只是符号，可以信任也可以被证伪。”③ 那么人和动物们之间进行传播活动时，至少有意或无意识地明白一点，“关于他们元传播的那些印记是符号”④。

为考察传播衍生的诸多新情况，我们“需要对符号的概念进行补充”⑤。这铭刻着弗卢塞尔（Flusser）从元层次对符号学的价值评估，“符号是象征的系统，其目的是使人类之间的传播成为可能”⑥。个体之所以要传播，是因为我们之间存在着意义的势能差。在此种明确的共识下，索内松（Sonesson）一言蔽之，只有当“表达和内容区别于主体的观点”，某物才是一个符号⑦。国内符号学学者赵毅衡先生断言，“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⑧，正因为我们丧失了意义和缺乏直接性的体验，才需要符号实现传播活动。此时传播从意义富裕的一方传递给意义暂时匮乏的一方，并表现为围绕意义展开互动的结果和机制。这便印证了费斯克（Fiske）倡导传播符号学的学科建制，以符号学评估主体间传播的意义交换，而非仅聚焦传播的机械式传输过程⑨。较之传播的过程学派，意义学派更有助于我们透视人类传播的细部与深层及人文性。

然则，对意义的关注使得人们普遍默许“符号是一种假设，是人们在寻找意义的过程中人为创造的系统”，该系统被弗卢塞尔称作“第二自然”⑩，是从自然之中的飞跃，和对世界的疏离和陌生化。符号学忽视现实的纹理，例如物质、技术、自然，成为纯粹的人为性的织物和远处的表征。这一论断成为学者对符号学的普泛评价。

法国媒介学者雷吉斯·德布雷（Regis Debray）不满 20 世纪 60 年代普遍的符号学转向，他甚至直接表示：“我们可以把媒介学与符号学对立起来，就像幽默与讽刺那样”⑪。在他看

---

① 董仲舒撰：《春秋繁露十七卷》卷五，凌曙注，清光绪五至十八年定州王氏謙德堂刻三十二年汇印畿辅丛书本，第 12 页。

② 赵星植：《赛博时代与传播符号学的媒介转向》，《当代文坛》2021 年第 1 期。

③ Bateson, G.,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p. 178.

④ Bateson, G.,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p. 180.

⑤ 〔巴西〕威廉·弗卢塞尔、〔德〕斯特凡·博尔曼编：《表象的礼赞：媒介现象学》，周海宁、许凌波、周轩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 年，第 53 页。

⑥ 〔巴西〕威廉·弗卢塞尔、〔德〕斯特凡·博尔曼编：《表象的礼赞：媒介现象学》，周海宁、许凌波、周轩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 年，第 53 页。

⑦ Sonesson, G., “The Meaning of Meaning in Bi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A Semiotic Reconstruction,” *Sign Systems Studies*, vol. 34, no. 1, 2006, pp. 135 – 214.

⑧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1 页。

⑨ 〔美〕约翰·费斯克：《传播研究导论：过程与符号》，许静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2 页。

⑩ 〔巴西〕威廉·弗卢塞尔、〔德〕斯特凡·博尔曼编：《传播学：历史、理论与哲学》，周海宁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 年，第 55 – 56 页。

⑪ 〔法〕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宣言》，黄春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56 页。

来，“人们过度地把世界解释成符号，因而忘了下面还有别的，忘了文字本身也有身体”①。鲍里斯·格洛伊斯（Boris Groys）也说：“符号遮蔽了人们射向承载着符号自身载体的目光”②，我们不如去揣测媒介本身。那么媒介学所要追寻的便是消除能指的虚幻，向世界的纹理，材料、矢量和技术还原。“就是让符号向痕迹靠拢，话语向过程靠拢，阐释向仪器靠拢，文本向资料靠拢，文字向书写靠拢，传播本身向传播途径（道路、运河、铁路）靠拢，口语向发声器官靠拢，记忆向存储器靠拢。所谓存储器，就是痕迹的物质载体以及与之相关的记忆法和编码与存储手段（书面、模拟、数字，等等）。”③

媒介作为存储器的观念，在德布雷等人这里已经呼之欲出，媒介载体基本上都要对符号进行两种运作：存储和传输，此种工具手段的媒介本体论流行说法，实际上铭刻着符号与媒介分离的认知预设：“物质的符号载体被当作符号意义的任意的和外在的运输工具”④。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当下对媒介物质性研究的呼吁。援引克莱默尔（Krämer）的观点，正是媒介的物质性“给意义的‘剩余物’奠定了基础，也给意指的‘剩余价值’奠定了基础，但这个剩余的东西完全没有被符号使用者所意向，也完全不受符号使用者的控制”⑤。学者们高度敏感地看待媒介物，构筑起对符号学的清算方式，但也生发了“只见物质不见内容”⑥ 的隐忧，走向批驳的另一极点。可见，符号与媒介的分疏，及其背后若隐若现的两极图式对立模态，提示了众多的理论困境。

“媒介即讯息”的先锋宣言，拒斥了以文本中心的论调，使麦克卢汉（McLuhan）被视为权威而不断地被援引。事实上，此种主张也源自媒介与讯息、符号分离的内嵌预设，并有意识强调不同媒介之间的比较和选择。麦克卢汉通过削减、悬置某一媒介既有的文本脉络，以比对符号加载在其他媒介的表达形式，进而得出媒介即讯息的判断。换言之，媒介的讯息被麦克卢汉视为不同媒介携带讯息之间统计学意义上的相互减差。然而，此种媒介置换、对比的阐释策略，很难说明这是媒介本体层面的讯息，还是符号发出主体的把控的讯息。正如格洛伊斯（Groys）批评的那样，麦克卢汉“进行这样分析的基本前提却在于一种确信，即每一个言说者的主观策划的讯息，能够在分析中与媒介的讯息区分开来，这样过后才能够清楚地展现，一个讯息是怎样修正甚至压过了另外一个讯息。而这种确信是十分成问题的”⑦。但格洛伊斯本人却没有注意到，此种模糊性更为根本地来自另一种确信，即符号与媒介的分离。

符号学家赵毅衡曾试图解开媒介与符号间纠葛的关系，他认为当表意时空距离出现时，才

① 〔法〕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宣言》，黄春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52 页。

② 〔德〕鲍里斯·格洛伊斯：《揣测与媒介：媒介现象学》，张芸 、刘振英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1 页。

③ 〔法〕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宣言》，黄春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48 页。

④ 〔德〕西皮尔·克莱默尔编：《传媒、计算机与实在性：真实性表象和新传媒》，孙和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第 68 页。

⑤ 〔德〕西皮尔·克莱默尔编：《传媒、计算机与实在性：真实性表象和新传媒》，孙和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第 69 页。

⑥ 胡翼青、姚文苑：《重新理解媒介：论界面、内容、物质的三位一体》，《新闻与写作》2022 年第 8 期。

⑦ 〔德〕鲍里斯·格洛伊斯：《揣测与媒介：媒介现象学》，张芸 、刘振英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62 页。

需要异物质媒介①。例如恋人之间手写的情书，纸张是媒介，上面的文字则是符号。换言之，此时符号载体承载意义感知，而媒介则起到传输和跨越距离的作用。“当代媒介学，研究对象事实上是载体以及/或者媒介。”② 但是，这个结论因为假定了特定的符号意义的传输过程，因此也留下讨论的余地。

在赵毅衡先生看来，在具有表意距离的情况下，媒介成为一个自律的中介，不会介入发送者的意图意义。即使费斯克本人也将媒介理解为中立传播渠道，是等待着填充意义和信息的物理手段或者技术③。然而，当下的媒介现实已经表明，媒介自身已经纳入文本解释过程，完善、增幅表意过程。作为情书文字承载的薛涛笺和一般白纸，显然在情人眼中有不同的价值。符号与媒介是无法完全分离，此时媒介自身成为符号文本，启动和重建了连续不可感知事件的潜力。借助于媒介的这种物质性力量，事实上无论是否具有明显的表意距离，“符号要比符号的使用者所意味的东西，表达出更多的东西”④。由此不妨说，媒介不仅仅是符号，符号中也保存了媒介的纹迹，符号文本并非媒介的表面和可以裁剪、拼贴的意义，而媒介物也并非符号的自律性中介。而在此种相互的持存中，媒介符号学的视角或能调停大部分论争。

那么中国屏风作为“障碍媒介”与媒介符号学的关联在于：其一，按照前人对媒介和符号的一般定义，屏风既是媒介也是符号，不仅是符号载体也成为符号自身，并胶结在一起发挥作用。因此媒介符号的合称便有了实际层面的日用正当性；其二，“障碍的媒介性”实际上关注的是“障碍”如何在传播场景中起到建构和发生学的功能，因而被称为“媒介”。按照一般的传播过程范式，“障碍”被视作对手般的存在，因其阻断了传播，是对传播过程的亵渎⑤。而正如引言中所提，本文关注屏风作为有意放置的“障碍”中止了传播过程，通过模糊传播对象的“在场”唤起解释者的意义经验，从而增添传播意义的丰度。原本被中止的传播过程，在意义的补足中重新连续起来。

“符号学是研究意义的学说”⑥，交往需要直面意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关乎学科本源的重要范畴。再加之，媒介符号学相较于一般符号学和传播符号学，更加注重媒介－符号的连续统，那么以这一理论视角去关注屏风在古人传播场景中的意义生成与交往活动，本质上也以意义的形式表明了一种主体价值性的人文立场⑦。

综上两个方面而言，倘若要细究屏风非但没有缩减意义传输的距离，反而借助增幅空间与时间实现了其“媒介”功能。媒介符号学的连续视角，或能帮助厘清屏风作为“障碍媒介”意义传播机制，也能在运用中检验此种连续观念的理论效价。

诚然，在现有的传播学和符号学交叉研究地带，符号学因关涉人类最基本的意义优势，容

---

①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120 页。

②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121 页。

③ 〔美〕约翰·费斯克：《传播研究导论：过程与符号》，许静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15 页。

④ 〔德〕西皮尔·克莱默尔编：《传媒、计算机与实在性：真实性表象和新传媒》，孙和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第 69 页。

⑤ Cubitt, S., “Temporalities of the Glitch: Déjà Vu,” in Bengnet, M., Cameron, A., & Fetveit, A., eds., *Indefinite Visions: Cinema and the Attractions of Uncertainty*, UK,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299－315.

⑥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3 页。

⑦ 胡易容、康亚飞：《“‘沉默’传播”：中国古代“讳文化”的普遍符用学阐释》，《国际新闻界》2021 年第 9 期。

易被视作方法论要素和展开的具象操作路径。本文正是延续着符号学方法论意识的同时，也期望借助媒介符号学视角对传播符号学基础理论进行一个讨论和尝试性的建构。

三、隔而不断：屏风的符用与“泛媒介功能”演进

从方法论出发，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W. Morris）的“符用论”可作为核心的分析工具。莫里斯在《符号理论基础》（*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Signs*）中系统提出符号学关系三向度的讨论，即“符形（syntactics）”、“符义（semantics）”、“符用（pragmatics）”。其中符用学则是关于符号与使用者之间的关联，研究人与接受和发出符号的使用方式①。而这实际上也与媒介使用是相互连通的，“符用”也继续保持了媒介符号连续观点。由此，对屏风“符用”的“考古”式回溯，有助于揭示在中国屏风日用的文化系谱学。换言之，即在各有错落的历史中考察屏风的媒介符号功能，探寻屏风这一媒介符号在诸多交往场景中是如何生成障碍的同时又确保意义的通达和传播。

（一）藏风纳气：天人沟通的调适媒介

“天人合一”一直是中国古代思潮流派的重点命题。例如儒家的“天命论”和道家的“道法自然”以及老庄哲学中的“天地与我并生”。天人合一的理想状态离不开“天人沟通”。在古代与天地交往后传达治理人间，往往是“圣人”的特权②，《周易》中便记载圣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③。普罗大众意图“知天意”大多借助“司命”开展的祭祀仪式。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祭义》中点明了祭祀的功能：“祭之为言际也，与察也，祭然后能见不见，见不见之见者，然后之天命鬼神”④。然而准备祭品、背诵祝祷词、选取祭祀期会等系列行为的仪式化特征，在某种程度上限定了祭祀的日常性。因此普通民众便转向借日用器具以实现天人沟通的愿景。

屏风正是民众与自然协商沟通的一种调适媒介。屏风的基本功能在古代训诂文献与日用类书中得到了清晰的界定，《说文解字》说：“屏，蔽也。”⑤ 屏风最初便是用以屏蔽自然之风；《艺文类聚》中记载屏风：“雍闕风邪，雾露是抗”⑥。古代建筑基本上是土木结构，保暖和御寒的效果欠佳。屏风顾名思义，便是满足阻塞风湿，避免风寒侵入人体的需求而制作的日用装置。因为屏风所障之风，在古人看来是对人身体有害的“风邪”，是引起各类身体疾病的首要因素。正如《黄帝内经·素问》记载：“风者，善行而数变……故风者，为百病之长也，至其变化，乃为他病也，无常方，然致有风气也。”⑦ 风邪引起的各类疾病并无规律，但其根源都是风邪入侵。明朝文学家赵时春有言：“右屏风挡西风之律，卒令我不随时萎，长白发。左屏风挡东风之怒号，令我寿命长牢固。”⑧ 清人周嘉胄在《装潢志》中亦记载：“必安地屏，杜湿

① Morris, C. W., *Writings on the General Theory of Signs*, Boston: De Gruyter Mouton, 2014, pp. 21 – 22.

② 潘祥辉：《传播之王：中国圣人的一项传播考古学研究》，《国际新闻界》2016 年第 9 期。

③ 《周易注译》，赵辉贤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9 年，第 13 页。

④ 董仲舒撰：《春秋繁露》，凌曙注，清光绪五至十八年定州王氏謙德堂刻三十二年汇印畿辅丛书本（1906），第 10 页。

⑤ 许慎撰：《说文解字》，汤可敬校译，北京：中华书局，2018 年，第 1731 页。

⑥ 欧阳询撰：《艺文类聚》卷六十九，汪绍盈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1202 – 1203 页。

⑦ 《黄帝内经》，李郁、任兴之编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8 年，第 85 – 86 页。

⑧ 《赵时春文集校笺》，杜志强校，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49 页。

上蒸。”[①] 故而屏风依靠其物理形制，成为“虚邪贼风，避之有时”[②] 的一种有效调适媒介，在人与宇宙自然的沟通中起到协商、改造和适应的功能。

另外，屏所敝之风，亦与古人的风水民俗信仰有关。风水在传统文化中可以视作个体与天地、自然、鬼神等的一种沟通形式。古人在家中摆设屏风大多是实现对“气”的调节。作为调适媒介的屏风，便能起到藏风聚气的功能，是人与自然、神灵、宇宙沟通的媒介化身，从而帮助建立“事神致福”的文化契约。按照风水学者的主张，在风水系统中“气”是其精髓[③]。万事万物皆由“气”生，东汉王充在《论衡·自然篇》中写道：“天地合气，万物自生。”[④]《礼记·乐记》中点明万物与“气”相生于阴阳两气中：“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⑤]。而“气”的生成则有“风”与“水”相关联。东晋郭璞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⑥]

清人撰写的日札史料记载：“将过厅后屏风关上，由旁角门出入，似觉中宫不泄气也。”[⑦] 按照古人的风水观念，“聚气”形成气场必须对风进行合理利用，强风吹散扰乱气场致使“泄气”，无风则意味着气场无法循环相生便会造成“死气”。此时，屏风构筑起古人对“气”的疏导、集聚、利用为形式的天人沟通信念，生成着一种独特的媒介契约。而正如《黄帝宅经》曰：“故宅者，人之本。人以宅为家，居若安，即家代昌吉。若不安，即门族衰微。”[⑧] 由此可见，古人在家中常设屏风，很大程度上是为实现对家宅风水的调控，并将其视作实现家族繁荣兴盛的情感寄托和愿景承载。

（二）庭院深深：营设人际交往场景的边际媒介

彼时，人们之间交往多为面对面人际传播的形式，并且主要发生于会客厅堂之上。厅堂中屏风除了前述的功能之外，还起到区隔、构建、界定、掌控传播场景的边际媒介功能。据《史记·孟尝君列传》载：“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⑨]《东观汉记·萧彪》也有类似的记载：“父有宾客，辄立屏风后，应受使命。”[⑩] 史料显示，古人会客交往往往在屏风后安排侍从，或聆听记录主客之间的交流，或随时待命侍奉。显然此处的屏风是隔而不断的，它阻滞了客人的视线，但未阻挡声音的传播，只有主人是公开与私密空间和位置的实际掌控者。

屏风“亦所隔形也”，便划定了私人空间与会客交往的公共空间，避免了前来拜访者一眼穿堂，窥视私密性较强的后宅。清代李渔在《闲情偶寄》中便说：“藏人屋后者，亦不必定在墙垣之外，厅堂必有退步，屏障以后，即其处也。或隔绛纱，或悬翠箔，但使内见外，而外不见内。”[⑪] 这里的屏风和纱幔均起到划分区隔空间位置的作用。空间并不是与意识形态和社会

① 周嘉胄撰：《装潢志》，杨正旗注译，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87 年，第 45 页。
② 《黄帝内经》，李郁、任兴之编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8 年，第 2 页。
③ 北京乾圆易学文化研究院编著：《易学与建筑环境学》，北京：北京工业美术出版社，2018 年，第 230 页。
④ 王充撰：《论衡》，劭毅平注译，北京：国家图书出版社，2019 年，第 235 页。
⑤ 《礼记》，胡平生、张萌译，北京：中华书局，2017 年，第 904 – 905 页。
⑥ 《四库存目青囊汇刊》，北京：华龄出版社，2017 年，第 23 页。
⑦ 有泰撰：《有泰日记》，康欣平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 年，第 465 页。
⑧ 王玉德、王锐编著：《宅经》，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 9 页。
⑨ 《史记》，北京：线装书局，2006 年，第 328 页。
⑩ 刘珍撰：《东观汉记校注》，吴树平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第 884 页。
⑪ 李渔：《闲情偶寄》，北京：知识出版社，2015 年，第 256 页。

生活保持距离的科学对象，空间的占有和分割是政治经济地位的体现①。也如《论语·泰伯》中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②，在此交往情景下，屏风作为确立交往等级秩序的边际媒介，承载着配置外室和内室、主与客等多个中心的功能。由此屏风便将抽象的空间具体化，帮助生成一种家庭人伦关系控制和空间交往秩序的政治学。

同时，屏风在显隐之间生成空间的流动性，其背后昭示的是主人家可操制的交往能动性权利。屏风并不似一堵墙壁一样直接隔断。"舍则潜避，用则设张"③，可折叠和移动的特性，以及云母、琉璃等半透明的材料介质，决定其建构交往场景的媒介逻辑，既不是一分为二的"隔"，亦不是一览无余的"得"。《闲情偶寄》中便载有半透明的琉璃屏风的作用，"欲人窥见室家之好耳"④。借助半透膜的材料，古人以"若有似无"的隐晦方式向宾客炫耀家宅建筑，甚至婉转地表露家族经济实力。可见屏风建构传播场景的暧昧性和纠缠性划定了交往秩序，也时刻提示着古人沟通之间的阶层政治疏离。

屏风除了在交往场景中持存物质财力和权力的疏离之外，其用于空间气氛美学的创造和经营，也在规训着群际品位区隔。古人审美意趣的操制、规则和定理的集合，被配置于屏风这一符号物质元素上，有意识地、有策略地生成审美样态。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载，"无深远则浅"与"深远之意重叠"⑤，强调空间深远的意蕴。屏风隔而不断的特性，使得空间的划分变得主观和暧昧，携带着朦胧和含蓄的美感。中国古代建筑大多以中轴线的纵深形制展开，尤其是宫庙建筑。正如巫鸿看到的那样，"宗庙建筑形式一方面以中轴线为引导朝拜者接近这一'秘密'的线索，另一方面又以重叠墙垣阻挠过易的接近"⑥。而罘罳便起到阻隔的功能。清人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专载："罘罳谓连阙曲阁也，以覆重刻垣墉之处。其形罘罳然，一曰屏也。"⑦此处的"罘罳"就是屏风，崔豹在《古今注》中也说："罘罳，屏之遗象也"⑧。不似木质的屏风可以移动和收纳，它是土木结构的楼阙，设立在大门内，厅堂外亦起到阻滞视线的作用。

古人为避免中轴线上透视的一览无余，选用影壁承继了屏风"隔而不断"的特性。这种屏障不是绝对的，人们转身影壁之后，便能窥见之后的空间秩序，从而延缓了时间和空间的接触，塑造庭院深深的气氛美学。布尔迪厄（Bourdieu）提示道，我们不应该将审美配置视作是区分的辅助和次要成分⑨，与之相反审美趣味往往是贵族世袭的连续性的显现，并由此肯认背后的社会身份。一如在《红楼梦》中贾政在率领一众清客初探大观园时，便被迎面一带翠障挡在前面，贾政便道："非此一山，一进来园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则有何趣。"⑩ 可见彼时，人们在经营传播场景，控制社交边界乃至昭显阶层雅趣时，"隔而不断"的屏风及其诸多变体

①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by Nicholson, S. 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imited, 1991, p. 16.

② 《论语》，杨伯峻、杨逢彬注译，长沙：岳麓书社，2018 年，第 103 页。

③ 欧阳询撰：《艺文类聚》卷六十九，汪绍盈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1202－1203 页。

④ 李渔：《闲情偶寄》，北京：知识出版社，2015 年，第 256 页。

⑤ 郭熙撰：《林泉高致》，梁燕注释，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105 页。

⑥ 〔美〕巫鸿：《从"庙"至"墓"：中国古代宗教美术史发展中的一个关键问题》，郑言、王睿编：《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年，第 557 页。

⑦ 顾炎武：《日知录校注》，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1861 页。

⑧ 崔豹撰：《古今注》，牟华林校笺，北京：线装书局，2015 年，第 54 页。

⑨ 〔法〕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年，第 43 页。

⑩ 曹雪芹：《红楼梦》，北京：华文出版社，2019 年，第 152 页。

构成了一类关键媒介。

（三）物绘同源：自我传播的建构媒介

古人制屏风其面板多以玉石、金银等介质为主，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屏风的在彼时各个社会层级之间的流行。故而，桑弘羊在《盐铁论》中才说：“一屏风就万人之功”①。稀有自然之物的奢侈化使用，在科学知识尚未被完全掌握的时期，本身就体现了一定的神奇与神圣之感，而这种转化的能力往往是由权贵所独享的，自然之物“自然就形成了一种政治权利”②。例如《西京杂记》中记载赵飞燕为皇后时钟爱“琉璃屏风、云母屏风”③，纹饰奢华。

借由符号的承载，屏风从物的一端转向符号化，这使得屏风流行受限于金石材料的境况，在唐宋以后有所改观。按照前人的说法，木质屏风不入流，因此他们将玉石面板转换为木质或者丝绢，并在其上饰以笔墨。屏风表明意义丰度的提升，将视觉中心吸引至符号意义，借此削弱了以往屏风因其材质贵重而携带的权贵气息。由此屏风作为绘画等艺术符号的符号载体，承担着传输信息的媒介功能，飞入寻常百姓家至此逐渐盛行。

这一转型过程，使屏风由日常交往场景中互动秩序的建构与维护，逐渐转向在日常情境中塑造自我，演化为一种人内传播的媒介。在谢清果等看来“身”即个体，古人通过内向传播审视自我，而“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古代社会交往形式均是以“修身”为基础的自我传播之继往④。北宋宰相苏颂有诗曰：“古人铭枕戒思邪，高士看屏助幽况。”⑤ 虽然此处的枕屏指的是床榻周围的屏风形式，但该诗也道尽了宋代文人之于屏风基本符用取向：将自我作为“潜在观者”进而符号意义的解释与生产，这帮助具象化了屏风作为古代人内传播媒介的两种主要形式。

其一，屏风及其表面的文字符号协同起到自我规训与自我形塑之“修身”效用。此时屏风铭刻的“箴言”或记述的传记，在自我生成维度起到框架和控制功能。援引赵毅衡先生的观点，“意义不在场，才需要符号”⑥。由此，古人通过具象的“符号铭刻”指称抽象的情感理念，使得意义可感可知。郑玄在《周礼注疏》中点出了“铭”的作用：“铭之言名也。生则书于王旌，以识其人与其功，死则于烝先王祭之。”⑦ 李溪在讨论屏风表面的符号铭文时也说：“作为一种‘述’的媒介，铭文起到记录功德的作用，以称显自我与家族之名。”⑧ 此言不尽然，屏风界面书写的铭文，更多的还是起到“自我正名”的外彰，“自我规训”的内省，在自我传播中不断地控制着自我意识的建构，因此并不能完全地等同于青铜器等祭祀器具承担“记事表功”的媒介⑨。例如《旧唐书》中记载，“太宗尝命写列女传以装屏风”⑩，太宗将历史上有名的君臣事迹写满屏风⑪，借与屏风的朝夕相对起到自我内省和规训的故事。

① 桑弘羊撰：《盐铁论校注》，王利器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第 365 页。

② 潘祥辉：《传播史上的青铜时代：殷周青铜器的文化与政治传播功能考》，《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 年第 2 期。

③ 葛洪：《西京杂记》，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年，第 63 页。

④ 谢清果、王婕：《与时偕行：华夏文明传播的时间偏向》，《现代传播》2021 年第 3 期。

⑤ 苏颂：《苏魏公文集》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第 17 页。

⑥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47 页。

⑦ 《周礼注疏》卷三十五，郑玄注、贾公彦疏，上海：中华书局，1936 年，第 1147 页。

⑧ 李溪：《内外之间：屏风意义的唐宋转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63 页。

⑨ 潘祥辉：《传播史上的青铜时代：殷周青铜器的文化与政治传播功能考》，《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 年第 2 期。

⑩ 刘昫：《旧唐书·虞世南传》卷七十二，北京：中华书局，2000 年，第 1732 页。

⑪ 洪迈著：《容斋随笔》，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 年，第 340 页。

其二，古人亦借助屏风及其艺术审美符号陶冶或寄托性情，也即通过“养性”建构了仪式性的自我。屏风作为古人维持或勾勒自我的媒介，在此时侧重于个体层面的审美情操的升华与自我心流体验的经验意义。例如《北史》中记载：“平陈后，上以陈叔宝屏风赐大义公主，主心恒不平，因书屏风为诗，叙陈亡以寄曰：‘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①。大义公主有感屏风虽然是御赐，但是前朝陈叔宝之物，遂在屏风上书写诗歌以寄情，感叹世事多变与自我漂泊的命运。巫鸿谈及的物绘同源与屏画共生②，较好地概括了屏风是古代绘画的重要媒材。屏风作为符号载体的媒介，由此也成为媒介符号的连续体，一起被纳进中国古代的自我意义生产活动中。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屏风作为艺术符号的界面，或者是彼时的“屏幕”，凭借物绘同源的特性，屏风的遮蔽和屏蔽视线的基本功能并未被遗忘。“符号遮蔽了人们射向承载着符号自身载体的目光”③，此刻媒介符号与障碍之间的底层关联，正是依靠媒介符号的自我指涉。符号艺术史学家诺曼·布列森（Norman Bryson）说：“观看是将一种绘画形式转化为意义的行为，而这种转化是持续不断的。”④ 在此种持续不断中，媒介符号的自我指涉，占据了观者的注意力，而屏风背后的空间、人等对象，也因此被更好地遮挡了。

四、“障碍媒介”：屏风的传播隔断与意义通达

上述屏风的符用与广义“媒介”功能演化的历时性考察，描摹了屏风在不同时期古人使用意向之疏相。无论是作为古人与宇宙沟通的调适媒介，还是会客交际空间区隔营设的边际媒介，抑或自我传播维度的建构媒介。即使古人并未流露出媒介的意识，皆能以媒介称之。正如唐·伊德（Don Ihde）主张的那样，“实践可以先于对它的命名”⑤。事实上，通过这一考察路径，可以发现，屏风的泛媒介功能均是依靠其物理的真实在场来承载的。换句话说，无论以何种功能性媒介的称谓，作为屏风之名的前缀或后缀，均不脱离“屏障”的基本物质属性。也如明人李濂的呼吁，“屏以障风亦以蔽目，弗苛于察德乃育”⑥，我们不必苛求于屏风对品性的培育或表征。

（一）含蓄礼治：本土化的交往观念

需要补充的是屏风的“障碍性”使得交往的对象不在场，此处的对象，既包括人，也包括空间环境。“缺席”只是与对象拉开了距离，对象实际还在屏风后。那么回归屏障的本质，我们是否能找到“障碍”的媒介机制，它构筑起或生产了前述的泛媒介功能？对上述疑问的解释，可能需要率先考察国人的本土交往观念，才能帮助廓清屏风作为“障碍媒介”的发生学机制，进而回答障碍如何成为一种媒介。

首先，屏风使对象“缺席的在场”铭刻了古人含蓄美学和朦胧意境的文化礼制。老子倡导“不言之教”⑦；孔子也说：“天言何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⑧。屏风在会客、朝会等场

① 李延寿：《北史》卷九十九，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校刻本，第 13 页。

② 〔美〕巫鸿编：《物绘同源：中国古代的屏与画》，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20 年，第 i 页。

③ 〔德〕鲍里斯·格洛伊斯：《揣测与媒介：媒介现象学》，张芸 、刘振英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1 页。

④ 〔英〕诺曼·布列森：《视觉与绘画：注视的逻辑》，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04 年，第 16 页。

⑤ 〔美〕唐·伊德：《让事物“说话”：后现象学与技术科学》，韩连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33 页。

⑥ 李濂：《李氏居室記》卷五，明嘉靖二十三年大梁李氏家刻本。

⑦ 《道德经》，安伦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 年，第 87 页。

⑧ 《论语》，杨伯峻、杨逢彬注译，长沙：岳麓书社，2018 年，第 221 页。

景的陈设，实际上是国人崇尚含蓄、委婉，忌讳浅露的文化无意识，被平移至古代的交往活动中。据《后汉书》载：“时上姊胡阳公主新寡，上与共论朝臣，微观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上曰：‘方且图之。’后弘见上，令主坐屏风后。”① 倘若我们将女子相亲视为传播活动，那么屏风在其中便扮演着“障碍”媒介的作用。“礼始于谨夫妇，为宫室，辨内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内。”② 女子们“犹抱琵琶半遮面”式倚屏含蓄交往的情姿，往往是古人推崇的家风与品性的显现，而这背后也是文化礼制的渗透使然。

其次，古人的交往理念亦讲究避讳③，避免确立的交往秩序的被冲击。不同于文字与语言避讳的发生机制，屏风依靠真实的物质在场，使得古人的行为避讳更加具象。《后汉书》记载了屏风作为“障碍媒介”的交往避讳功能，“每正朔朝见，弘曲躬而自卑。帝问知其故，遂听置云母屏风，分隔其间，由此以为故事”④。彼时，第五伦比郑弘的官位低，但第五伦早年对郑弘又有举荐的恩情，皇帝知道后便放置云母屏风将两人隔开，缓解地位之间的尴尬。甚至如祭祀活动，在开展这一传统民间家庭的“拟想互动”⑤ 时，国人也强调“避讳”。据清人毛奇龄所撰《辨定祭礼通俗谱》载：“室堂俱中设二案，一近西为始祖位，一近东稍南为世室位，两旁各五案为祧祖位。启左祏设一短屏，蔽长房高祖。”⑥ 显然，此时屏风无疑是恰当的“障碍媒介”，它帮助回避古人与先祖沟通时的秩序冲突。

由此倘若我们细致地究根揭底，可以发现屏风作为一种“障碍媒介”的可行性，正是筑基于国人以“礼引领”的本土化交往观念。无论是古人传播理念中的曲折含蓄美，抑或人际传播中的行为避讳，实际上是国人礼治的观念所向和实践操演。在胡百精看来，礼“彰显中国文化特质的交往规范体系”⑦，从与神灵沟通的祭祀之礼到君臣朝觐之礼，再到家礼，礼引领了关系网络与共在的意义世界。古人事神致福演变而来的礼器文明，帮助说明了“器以藏礼”的基本功能。屏风作为一种器具的独特之处，便在于依靠其障碍性，承载、构建、创生传播意义，进而以媒介符号的形式，构成障碍媒介性的意义通路，成为在地交往观念的具体指涉。

（二）有隔有通：“障碍媒介”的发生学机制

媒介交换和运输缩减了传播的时间与空间距离，其缩减时空的能力来源于对时间耗散与空间流动的抵抗表现出的坚韧，进而才有了媒介偏倚时空的理论。因此无论是早期经典的麦克卢汉式媒介观念，还是当下流行的德国媒介学派的理论，均强调媒介作为信使的连通能力，它使得“空间上相距遥远的事物变得很近；而时间上前后相继的事物变成了同时发生”⑧。

只不过该论调实际上是对于费斯克划分的传播过程学派而言的，它“关心诸如传播效率和传播精准性等问题”⑨。在他们那里，理想的媒介需要一些神奇的美德，例如德布雷眼中的光

---

① 范晔撰：《后汉书》卷二十六，李贤等注，武汉：崇文书局，2016 年，第 772 页。

② 孙希旦：《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第 759 页。

③ 胡易容、康亚飞：《“‘沉默’传播”：中国古代“讳文化”的普遍符用学阐释》，《国际新闻界》2021 年第 9 期。

④ 范晔撰：《后汉书》卷二十六，李贤等注，武汉：崇文书局，2016 年，第 772 页。

⑤ 张放：《祭如在：中国传统民间家庭祭祀的沟通想象建构》，《国际新闻界》2023 年第 3 期。

⑥ 毛奇龄：《辨定祭礼通俗谱》卷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42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789 页。

⑦ 胡百精：《共识与秩序：中国传播思想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年，第 34 页。

⑧ 〔德〕西皮尔·克莱默尔编：《传媒、计算机与实在性：真实性表象和新传媒》，孙和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第 67 页。

⑨ 〔美〕约翰·费斯克：《传播研究导论：过程与符号》，许静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1－2 页。

线，“无偿、干净、非物质、简单、直接、几近即时的。没有渐弱也没有偏斜。没有杂音也没有干扰。没有延迟也没有往复”①。在此种明确情况下，“障碍”意味着“不通”，便不能构成过程学派范式下的媒介本体论。

然则，“世上既没有纯洁的介质，也没有无痛的传输”②。过程学派的媒介学宣言，言不尽“媒介”之意。相反传播的符号学派“从来不把误解看作是传播失败的必然证明”③，侧重意义的协商与解释，传播路径的“不通”反而为符号的协商与解释留有余地，这便为“障碍”洗脱了原罪。“正是克服障碍的努力，引起了某种决定性的转变。外部事物造成的逆境导致人类发明一种全新的存在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可以说，人类正是在遇到障碍的时候才创造了自身。”④ 显然，在人类的传播活动中，如果初始的意义势能在遇到障碍而止步，这与现实中人类努力征服障碍的现实是不相称的。

回看本文的研究对象，屏风作为“障碍媒介”可以被视为某种传播活动展开的起点与转折点，存在着意义势能的迂回点。媒介时常处理着“在场”与“缺席”的关系，而借由“转喻性地呈现缺席”，在场才能更好地被激发⑤。那么屏风作为一种障碍物，其“媒介”的生成机制便在于：首先，通过增幅表意的时空距离，也即增加了时间，扩大的空间，以缓和或中止传播过程；其次，“中止”，并非“终止”，意义的流通仍在继续，并且依靠其自身作为媒介符号的连续统，增加了意义的丰度。

具体而言，障碍这一与过程学派预期相悖的“不通”铭刻的或然性，可以被凯瑟琳·海勒（Katherine Hayles）设想为“一切新事物的源泉”⑥。皮尔斯（Pierce）则将重心转嫁至解释意义或然性的“试推”，在其看来个体的“知觉是解释性的”⑦。推动知识进步的不是权威和确定性，而是障碍的媒介性引发的揣测。那么在或然性解释（试推）的过程，“解释项不停地变成（新的）符号，如此延绵以至无穷”⑧。另外，香农（Shannon）和韦弗（Weaver）对诸如冗余、噪音等障碍的洞察，也引起了艾轲（Eco）的兴趣。他阐释道，噪音的诗学，可以通过维持模棱两可来产生意义的潜力⑨。

可见，从传播的基本的意义维度出发，他们均试图表明障碍提供了创造性的开场白和基线，允许将现有的社会和文化传播实践中不能实现的内容，予以重新意义化。也即“障碍媒介”使得无序引发秩序、空白生成的复杂、缺席引发在场，它成为自成的系统或传播实践，打开了一

① 〔法〕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宣言》，黄春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78 页。

② 〔法〕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宣言》，黄春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42 页。

③ 〔美〕约翰·费斯克：《传播研究导论：过程与符号》，许静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2 页。

④ 〔瑞士〕让－斯塔罗宾斯基：《透明与障碍：论让－雅克·卢梭》，汪炜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 453－454 页。

⑤ 〔美〕埃尔基·胡塔莫、〔芬〕尤西·帕里卡编：《媒介考古学》，唐海江主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317 页。

⑥ Hayles, N. K., *Chaos Bound: Orderly Disorder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Science*,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51.

⑦ Peirce, C. S., *The Essential Peirce: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ritings*, vol. 2,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1998, p. 229.

⑧ 〔美〕皮尔斯：《论符号》，赵星植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32 页。

⑨ Eco, U., *The Open Work*,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50－58.

个间隙，作为不确定引发自由的指标，构成了密集而广泛的意义创生及其传播的可能性。

沿着这条思路深入下去，我们或许可以瞥见“障碍媒介”并非仅关注媒介自身，而是关涉周遭的媒介关系。也即，“障碍媒介”不是关于某类客体自身，而是注视客体与人之间的发生学关系与异质性系统间动态且接连不断的交往机制。最终，它越过了质询媒介的本体论，转而朝向为何成为媒介，以及如何成为媒介的问题。

国人讲求含蓄委婉，无论是建筑艺术形式，还是文字传播，正如清人钱泳在《履园丛话》中概括：“造园如作诗文，必使曲折有法”①。因此含蓄传播抑或交往之间的避讳行为，均描绘了“直言不讳”的传播模式，在本土历史上的不适应性。那么，屏风便照亮了传播与秩序在历史实践中互构关系的具象痕迹。“中国传播思想史基源问题乃传播成就秩序”②，作为“障碍媒介”的屏风，即使在当下亦时刻显现国人的交往观念，及其背后的礼治秩序。例如，我们可以设想当代家居建筑中诸如玄关等屏风的变种形式。显然，作为曲折含蓄、讲究避讳的媒介，屏风在赋予国人以礼引领的本土化交往观念方面仍旧是称职的。

五、结语：屏风之后、符号之实与媒介思维的谱系

现代媒介技术往往被要求做出消除意外，保持行为秩序的承诺，它们通过计算预演，以排除任何突发因素。快速、准确、智能、响应等特征，已经契合了现下传播的完美主义取向。随之带来的是对生产速度的不断提高，消费速度愈发加快的迫切需要。不妨说当下的传播与社会受利奥塔（Lyotard）定义的“最佳性能逻辑”③ 的支配和宰制，此时最佳性能表征着输入与输出的控制论意识形态，它由组建起一个效率、准确性和可预测性的无差错世界的梦想所驱动。得益于信息系统的有效控制，世界运作的秩序得以将自动化、智能化、效率化作为期待。那么，障碍、中断都是对完美传播过程的亵渎④。

然则，国人讲求事缓则圆、语迟则贵的含蓄精神气质、文化心理，这实际上是由背后的礼治观念所统摄。我们已经不难发觉，此种文化无意识被平移置古人的传播观念中，而中国屏风便揭示了这种别样的媒介姿态和交往观。虽然它并未做出时间和空间层面缩减的许诺，但并不意味着屏风不能成为一种媒介。一方面，偏向时间或空间并不足以构筑一种自给自足的“媒介本体论”；另一方面，“媒介本体论”是否存在，亦是一个尚存余地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屏风的符用与泛媒介功能之演化脉络，已经向我们说明，“障碍”可以成为一种媒介。

即使是今时今日，人际面对面（face to face）传播中，主体佩戴口罩以“遮丑”的交往策略，亦确证了“距离产生美”，与对象保持距离有其诱人之处的“障碍媒介实践”。障碍的媒介机制便在于传播过程“障碍媒介”遮挡引发了意义的悬置，也使一些新的意义得以构成，此时意义的生成使得传播发生转换，在这之前被隔断的传播过程，也在意义的补余中变得通达和自洽。同时，借助“障碍媒介”带来的割裂，新的时空单位、新的个体心理和集体的礼制

① 钱泳撰：《履园丛话》，孟斐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369 页。

② 胡百精：《共识与秩序：中国传播思想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年，第 34 页。

③ 〔法〕利奥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车槿山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5 – 6 页。

④ Cubitt, S., “Temporalities of the Glitch: Déjà Vu,” in Beugnet, M., Cameron, A., & Fetveit, A., eds., *Indefinite Visions: Cinema and the Attractions of Uncertainty*, UK,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299 – 315.

文化得以被构建。

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屏风作为一种媒介的想象力，在传播的过程学派那里显得捉襟见肘。因其与作为跨越时空、连接信息的媒介期待相矛盾。而从传播符号学的路径出发，爬梳“媒介符号”、“隔断传播”、“障碍媒介”的纠葛关系，也牵引出了别开生面的媒介符号学意涵。

其一，媒介符号学帮助我们重新审思媒介起到的连接作用，以及取消表意时空距离的媒介本体论的合法性，而去转向一种发生学的媒介观念。我们不仅追问媒介是什么，自然也包括为什么是媒介，以及如何成为媒介的问题。从本国的历史语境考察，媒介伊始便被理解为使双方发生联系，“媒，谋也，谋和二姓”①，并以“媒人”的形式出现。此时，“‘媒介’并不指媒体或介质，而是指媒介行为，也就是媒介方法的动态整体和介于符号生产与事件生产之间的中间体”②。

其二，它也有利于综合符号与媒介之间分离，话语与物质相疏的流行论调。正如毛里奇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主张的那样，媒介、物质等客体“可能会开始‘说话’，开始‘自我表现’”，这事实上也是媒介符号的连续统的基本观点，但这“不是资本主义拜物教，不是人类异化的证据，反而标志着一个需要一种新的符号学的新表达机制”③；最后，这一连续的观点，也让我们看到了费斯克划分的“意义学派”在某些方面的阐释能力，学派和视点间的互相交叉、借鉴和补齐，增加了见解传播理论的稠厚感，以及感悟文化的透彻力。

即使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Siegfried Zielinski）说：“现在媒介是过剩的，一点儿都不缺”④，尤其是当下愈发智能化、效率化的传播时代，但他后来也主张，我们还是需要一个媒介的概念，“它们应该足够开放，以便我们进一步采取行动”⑤。借助媒介符号学去讨论古代中国的屏风，实际上也是以全球文明发展史的视野去考察、填充媒介思维的谱系。在此种明确的情况下，本文的初衷不只是刻写被遗忘或边缘化的媒介，也即描写中国的历史人工制品。这既不可能也不可取，更为重要的是，每一人工制品在历史操作实践中镌刻着的中华文脉，及其体现的不同文明的媒介认识论。这一行动也说明，倘若本国的媒介研究仅仅靠引介，一味打通西方之“墙”，而不是自主性的对话，那么在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书写方面，也难以有新颖的情姿。显然，检视屏风这一堵东方之“墙”，其“有通有隔”的特性，已有足够的基础去讨论一种不同历史性质的在地媒介体验和在地媒介知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文化经典符号谱系整理与数字人文传播研究”（项目编号：23&ZD2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

① 许慎撰：《说文解字》，汤可敬校译，北京：中华书局，2018 年，第 2608 页。

② 〔法〕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宣言》，黄春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17 页。

③ Lazzarato, M., *Signs and Machines: Capitalism and the 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y*, Los Angeles: Semiotext (e), 2014, p. 64.

④ 〔德〕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媒介之后：来自逐渐退潮的 20 世纪的消息》，张艳、张昱辰、李凌燕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23 年，第 23 页。

⑤ 〔德〕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媒介之后：来自逐渐退潮的 20 世纪的消息》，张艳、张昱辰、李凌燕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23 年，第 18 页。

VOLUME 31, NUMBER 12, 2024

During the new era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Deng Xiaoping articulated a series of significant expositions on journalism work, forming the foundation of socialist journ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se expositions, rich in content and systematically structured, reflect both Deng Xiaoping's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CPC) journalistic principles in this transformative period. In this era, the CPC's journalistic thought, shaped by Deng Xiaoping's news ideology, laid the groundwork for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socialist journ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ideology remains a cornerstone of the CPC's journalism during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era and offers valuable insigh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journalism in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As the chief architect of China's socialist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modernization drive, Deng Xiaoping conducted numerous interviews with foreign media during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eriod. These interactions provided the world with a more comprehensive, objective, and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reform while highlighting the spirit of a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leadership through Deng's unique personal charm. Deng's engagement with foreign media established a new paradigm for China's external communication, fostering a favorable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 to support the nation's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efforts. The concepts, principles, and methodologies reflected in Deng's communications with foreign media were systematic and innovative, further enriching his thoughts on journalism and propaganda. These contributions hold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offer practical guidance for enhancing external exchanges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new era.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ole of the screen in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lens of media semiotics, focusing on the logic of media formation and the mechanisms of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As a continuum of media-signs, the screen's pragmatic functions and broadly defined role as a "medium" reveal a chronological evolution intertwined with material barriers. The screen extended temporal scales and spatial distances in ancient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disrupting and suspending interactions while simultaneously enabling the creation and exchange of meaning. The "barrier" function of the screen transformed the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meaning, making previously

isolated interaction practices accessible and self-referential through a process of meaning replenishment. This mediating role embodies the hierarchical logic of "de-mediation" and "re-mediation," highlighting the recursive transformation between materiality and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By adopting a localized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characterized by being "separated and connected," this study challenges the Western ontological view that barriers primarily reduce time and space to facilitate connection. Examining the screen as an Oriental "wall," this paper enriches the genealogy of media thought, offering a basis for exploring distinct, subtle, and slower-paced local media experiences and knowledge, in contrast to the rapid advancements of contemporary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49 · Navigating Uncertainty: How Social Media Influencers' Crisis Attribution Affects Public Perception of Responsibility

· Gong He, Zhang Yidan, Huang Miaohong

The traditional theoretical model of situational crisis communication increasingly faces challenges due to the openness of social media and the unpredictability of crises. This study aims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the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messages" conveyed by social media influencers and the public's perception of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Additionally, it seeks to incorporate the context of "ambiguous responsibility" into the model. To expand the exploration of crisis communication mechanisms, we introduce the variable "inference of manipulative intent," alongside other factors. Through three experiments ($N = 217$, $N = 237$, and $N = 420$), our findings reveal that influencers' messages about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significantly shape the public's perception of organization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credibility of the messages themselves. Specifically, when an influencer explicitly states that an organization is "responsible," the public perceives the organizational responsibility at its highest level. Conversely, when influencers present various possibilities regarding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their messages are perceived as more credible. However, if an influencer suggests that an organization is "not responsible," this undermines the message's credibility and increases the public's perception of the organization's responsibility. Interestingly, the influenc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did not interact with their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messages as initially anticipated. Furthermore, the degree to which the public suspects influencers of manipulating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messages affects their perception of organizational responsibility. As this suspicion rises, the impact of the influencer's messages diminishes. This study also examines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s between social media influencers and the public during crisis communication, offering valuable insights for both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68 · Deviation, Prejudice, and Bias: Conceptual Origins and Reflections on Media Bias

· Ma Ping, Pan Yixin

Media bias commonly refers to slanted or partial coverage in news reporting, a concept predominantly discussed in media criticism and research, especially within Western contexts. However, its translation into "媒介偏见" (media prejudice) in many studies emphasizes the subjectivity of media bias while overlooking its objective dimensions, leading to an oversimplification of the concept. This study examines media bias from both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perspectives, focusing on structural bias and partisan bias as its key forms. We argue that media bias arises from